

##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 第一章 地中海三个帝国攻城略地的金融动力

在人类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农业和战争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动力。前者是繁衍种群和进步的基础，后者是保护种群和进取的途径。历史常常留下伟大的人物和战争传奇，加入神话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密码，但刻意洗清背后操控和支撑的一个重要因素——金钱。金钱是交换的工具，可以交换一切物品甚至荣誉。如果被金钱左右，传奇和伟人便失去了神佑和天分，成为待价而沽的普通人了。事实上，越是依赖于金钱的人物和传奇，越会在历史记忆中被特别努力地与金钱拉开距离。

货币作为便利早期商业的共同交换物和定价标准，其演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从石块、贝壳、盐巴、牛羊等物品到具有稳定重量及成色，便于携带和反复转让的金属物件，大体经过了三四千年之久。世界上最早的货币源于吕底亚[1]王国，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产生了刀币和布币。不过，因为我们的文字记载不清，吕底亚金银币仍被业界视为更确定的早期货币。

吕底亚王国首都萨蒂斯位于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者地中海文明的发源地。吕底亚人在安纳托利亚[2]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开发了各种矿藏，其中尤以银金矿为主，吕底亚王国银金矿储藏丰富，吕底亚河流金砂密集分布，这是上天给这个国家的第一桶金。银金矿是一种金和银混合的矿物。他们用这种“白色的金子”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钱币。

克鲁伊斯国王在公元前560年继承了吕底亚王位，开始将流通广泛的金银币标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金本位。之前，人们使用货币时要反复称重量，看成色，程序复杂，交易成本很高。吕底亚狮币由金银合金铸成，由于货币上经常出现一只狮子的头像，因此被称为狮币，具体来说，狮币大概含54%的金、46%的银，重量约4.74克，直径约11毫米。由于采用标准重量和成色的块金为币，质量稳定，所以此类标准铸币很快随着吕底亚的扩张扩散到波斯乃至整个地中海沿岸，大大便利了吕底亚与希腊诸王国的贸易往来，吕底亚因此成为西亚地区的强国，积累了巨大财富并建立了阿提密斯神殿[3]。

克鲁伊斯国王倚仗巨大财富，开始了一系列的土地征服战争，一度控制了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所有城市。不过，他低估了东边刚刚诞生的波斯帝国而贸然发动进攻，结果大败。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设计用骆驼军队打败了吕底亚的骑兵，并捕获了克鲁伊斯本人，灭掉了吕底亚。但居鲁士大帝看重克鲁伊斯的理财能力，邀请他担任波斯帝国顾问，继续使用吕底亚狮币并将其推广到地中海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

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君主，他在位期间，波斯帝国达到全盛。他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征服者。在他短暂的统治生涯中，他建立了第一个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强国，征服了巴比伦、希腊和印度三个古文明发源地。大流士一世在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打了18次大的战役，铲除了八大割据势力的首领，使得偌大的波斯帝国重归一统。除了政治制度和军事能力优秀外，波斯帝国强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大流士建立了一套先进的商业制度和货币制度，历史上称为“大流士改革”。

“大流士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但内容上大都与经济相关。首先在赋税制度方面，大流士明确规定了各省的贡赋数额，每省均须向中央交纳一定的金银和实物。具体数额为：小亚细亚4省，每年交纳银1760塔兰特；埃及省交纳银700塔兰特；巴比伦—亚述省交纳银1000塔兰特；印度省交纳沙金，约值4860塔兰特；波斯省免税。各省的贡赋，根据各省资源而定，统一输交国库，每省除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外，还有各种土贡，如谷物、家畜等，以供宫廷的需要和各地驻军及远征军的军需。如埃及每年要给孟菲斯的波斯驻军供应谷物，而巴比伦—亚述省供应宫廷和帝国军队全年所需粮食的1/3。

大流士大帝还下令统一铸造和使用金币。由于波斯帝国的疆域十分广阔，各种货币和度量衡在许多地区通行，这就给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带来许多不便。大流士大帝根据当时西亚、北非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情况，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有铸造金币的特权，省区总督只许铸造银币，各自治城市只许铸造铜币。

统一后的金币，正面是他本人的头像，背面是一个弓箭手，这种金币叫作“大流克”，重约8.4克，成色最好，含纯金98%，银币叫作“舍克勒”，重约5.6克，20个舍克勒等于1个大流克。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是各地铸造的，成色不一，大流士又规定国库将纳税者所交各种银币分类，有白银或纯银、二等银、三等银等，按统一标准折算，纳税者要补交成色不足的差额。

因为计算得十分精细，货币铸造、重量和量度都被标准化，所以大流士被纳税者称为“小商贩”。这种金币、银币后来成为古币收藏家眼中的珍品。在货币流通方面，大流士规定帝国流通三种合法铸币，即金币流通全国，银币和铜币在一定地区内流行。这种不同权力的货币

分级体系在当时经济系统内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制度安排，不仅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且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集权和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波斯王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从部落联盟一跃成为世界上领土空前辽阔的奴隶制大帝国，其兴盛的原因无疑与大流士一世的改革密不可分。但是，帝国的税收政策和包税制度使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处境日益恶化，许多农民因贫困而破产，帝国兵源日趋枯竭，各地民族人民的起义不断爆发。在庞大的波斯帝国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一世及其后继者发动的波希战争，是波斯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波希战争历时半世纪，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被英勇捍卫自己独立的希腊城邦所击败。在战争期间，埃及、巴比伦等被征服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进一步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军事力量。波斯帝国的统治，主要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军事优势的动摇和丧失，使得帝国的集权统一难以维持。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的军队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粉碎。维持了200多年的波斯帝国遂告崩溃。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被称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一[4]。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3年中，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古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5]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疆域广阔的国家。

作为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儿子，同时还是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6年接过王位时，年仅20岁，他通过减少税收的政策赢得了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他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占领了雅典和希腊全境，东进攻入当时的世界强国波斯帝国，覆盖埃及、中东、印度和部分中国地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光环下，我们注意到，他的父亲菲利普二世长期控制着富有金银矿的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拥有的大量金钱，保证了亚历山大大帝雇用大量军队的能力。而且，亚历山大大帝在攻克波斯帝国首都后立刻掠走了500万公斤的黄金。

希腊与波斯的敌对始于公元前6世纪，当时位于小亚细亚的自由希腊城邦沦陷于向西扩张的波斯王国。在爱奥尼亚[6]叛乱和马拉松战役[7]后，公元前481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在第二次波希战争时试图占领整个希腊，但结果战败。虽然薛西斯一世被打回波斯之后再没有进攻希腊，但他在公元前480年火烧雅典卫城及其他被认为亵渎神灵的行为，使得亚历山大大帝时的希腊政界仍存在着报仇和反攻波斯的声音，这也被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所利用。

而在同大流士进行的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大帝用4万步兵和7000骑兵对抗大流士御驾亲征召集的波斯帝国各部族传说当中的20万步兵和4.5万骑兵，结果波斯帝国一战而亡，大流士逃出生场。取得阿贝拉会战胜利后，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进入巴比伦和波斯的两座都城——苏萨和波斯波利斯，并且经过长时间急行军终于追上了落荒而逃的敌人。波斯军队为了防止国王大流士三世投降，将他暗杀。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了大流士的继承人帕萨加提，彻底征服了波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病逝，马其顿王国随即分裂，亚历山大大帝部下将领各据一方，互相混战。公元前301年的伊普斯战役之后，它最终落得与被它征服的帝国同样的下场，分裂为几个独立的王国。

从金融角度纵观地中海这三个军事大国的历史，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诸国中，货币以金银币为核心，货币的积累意味着财富的增长，政治和军事强权都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也是基于金钱积累而攻守。货币的地位非常高，从货币的图案便可观见。吕底亚金银币是以狮子为图案的，大面值用狮头做标志，小面值则用狮爪做标志。亚历山大大帝去世40年后，继任者铸造了印有他头像的银币，表示自己是正统的继承人。银币上刻的是一个英俊青年，目视前方，双眼炯炯有神，头上长角，代表着希腊众神之王宙斯和埃及太阳神的交集。银币的背面则是雅典的胜利女神像和铸币国王的名字。同期，地中海沿岸广泛流通着各种不同王国的货币，基本图案都是象征勇猛的动物，如雄狮、公羊等，以及各国国王和众神像，象征积极进取和权贵。

反观同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早期货币也已经形成流通标准，刀币和布币是主要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刀币是从农业工具的形态而来，并非兵器的刀刃。布币也是从青铜农具“镈”（音博）演变而来的。铭文也只有地名和数额，并无人物和神物的表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刀、布、贝等各种货币，推行所谓“秦半两”，圆形方孔，右“半”左“两”的铭文，也同样沿袭旧例，不着权威标志。以笔者浅见，将货币维持在器用而非权威的位置上，自然有货币流通不如地中海文明那样普及之缘故，更重要的是货币地位低下，还不足以代表财富和权威。

早期货币的功用和地位，还是与当时文明的发展路径相匹配。地中海文明到希腊罗马文明的变迁是文明间冲突与交融的历史。由于金银矿藏开发和金银币的流通，特别是被赋予神权和王权的象征后，货币就成为独立于政权和军事能力的跨国跨时代标准，有力地推动了商业贸易活动，金钱成为了财富的同义词。中国的封闭农业大国环境使得早期货币源于农具象征，

局限在交换工具的层面上。低质铜合金的货币本位很难被赋予上层社会的财富内涵，再加上不断的意识形态压制，货币往往带有道德的贬义，甚至在文人圈里被耻于提及。这种货币观念一直流传到今天，影响着大众对于货币的理解和国家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

[1] 吕底亚 (Lydia)，小亚细亚中西部一古国（公元前1300年或更早—前546），濒临爱琴海，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

[2] 安纳托利亚，又名土耳其高原，在土耳其境内。

[3] 阿提密斯是希腊的狩猎女神，对古代人来说，狩猎可不是休闲的娱乐项目，而是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之一。故而，阿提密斯深受人们喜爱。阿提密斯神殿大约兴建于公元前550年，据说位于土耳其的古城爱菲索斯，公元5世纪前期被东罗马帝国皇帝奥德修斯二世摧毁。阿提密斯神殿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4] 其他三位是恺撒大帝、汉尼拔、拿破仑。

[5] 药杀水：古地名，就是现在中亚位于咸海的锡尔河。

[6] 爱奥尼亚：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其北端约位于今天的伊兹密尔，南部到哈利卡尔那索斯以北，此外还包括希奥岛和萨摩斯岛。

[7] 马拉松战役：是波斯军和希腊联军于公元前490年9月21日在希腊东部马拉松平原进行的一场激战。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第二章：恶性通货膨胀毁了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政府

物价上涨是稀缺资源在需求强劲时的自然结果，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历史现象。各种经济学派从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经济结构和货币数量等角度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制定了各种政策来应对物价上涨给社会带来的压力。通货膨胀一词也不容置疑地将社会和政治的关注集中在货币现象上，从而物价上涨始终被归结于上层统治者的权谋和手段。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强劲，人们开始注意到通货膨胀的全球相关性，特别指责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不负责任地发行纸币。

最早的通货膨胀与纸币毫无关系，始于罗马皇帝尼禄当政期间（54—68）。当时的罗马帝国统一了欧洲，侵占了亚洲，控制了非洲，与尚无正面接触的秦始皇统一下的远东中国成为两个最大的文明社会。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古罗马帝国被称为“大秦”，《后汉书·西域传》中描绘“大秦国一名广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堊堊之。有松柏诸木百草”。可见，罗马帝国红极一时，即使是遥远的中国也对其有所了解。

从公元前82年的马略[1]苏拉[2]之争开始，罗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最终恺撒终结了原始的公民共和制。公元前28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担任执政官，彻底清洗元老院。次年，屋大维向自己控制的元老院交出权力，还政于民，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3]”称号，罗马帝国从此时开始创立。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总共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广袤的土地加上战争俘获转成的奴隶，成为强大的帝国军队不断侵略的两大财富激励。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奴隶终会达到极限，扩张不得不中止。罗马帝国发展的重心开始转向内需。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税赋成为满足皇帝虚荣和控制能力的来源，同时也是瓶颈。

恺撒执政期间（公元前100—前44），罗马建立起了金银货币体系，罗马货币随着罗马大军的征服战争得以扩张到地中海周边辽阔的区域，而广阔的货币流通贸易，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罗马帝国对周边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控制力，大大增强了其实力。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物价稳定、税收适中、贸易经济繁荣，商业贷款利率处于4%—6%的稳定区间。

54年，尼禄皇帝上台。他具有艺术天赋，写诗、弹琴、歌剧、戏剧，几乎样样精通，但同时，他更是一个充满野心且穷奢极欲的人，罗马城市建设和贵族消费都在他的统治下达到顶峰。64年，罗马发生大火，燃烧了整整一周，罗马14个区中有10个被毁坏。在大火之后，尼禄皇帝开始大规模重建和新建纪忒性建筑，为了筹集工程资金，他采用了降低金银币成色的做法。

查看原图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当时，罗马已经实施了金属货币制度，金银铜币广泛流通在被占领区域，罗马币最为贵重。在无法继续提高税赋水平，同时不得不承担庞大军队和官吏群体的成本的情形下，尼禄开始在银币中普遍加铸廉价的金属，如铅、铜等，发行不足值货币（货币贬值）。很快，老的银币就陆续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价银币。这就是金融界所称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4]。货币贬值导致交易率低下、经济衰落，又需要政府继续投入更多的贬值货币，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政府信用和执政能力逐渐下降。

据记载，尼禄皇帝在位的14年间（54—68），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100%降到90%。到117年，含银量降到85%，到180年，含银量降到75%。又经过两任皇帝到211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仅

剩50%。从尼禄时代开始的货币渐进贬值周期持续了150多年。在1世纪含银量达90%的罗马银币在戈耳蒂安皇帝统治的238年含银量只有28%，而到了268年的克劳狄二世时，含银量已经下滑到只有0.02%。事实上，以银币发行量之大，如果足值发行，罗马帝国已经没有可以挖掘的银矿了。尼禄开了头，之后历代罗马皇帝都萧规曹随，如法炮制。此时的罗马银币如同今天的纸币一样，只有信用承诺和财富象征意义。根据英国著名学者琼斯（A. Jones）的研究，138—301年，罗马军人的服装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到3世纪末，小麦的价格上涨了200倍，按照复利计算，这段时间的物价上涨率每年在5%——6%。金属货币下的通货膨胀就这样发生了。

260—268年，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经济困境，国内叛乱不止，国外连年战争，由于货币面值很高但含银量极低，导致物价飞涨，税收加重，士兵开始哗变，以至于国王奥勒良在275年被刺杀。

面对市场上的怨声载道，政府试图改革。但是罗马帝国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采用了强制的管理手段来控制物价。戴里克先皇帝在301年颁布冻结物价的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其中包括小麦、棕榈油、甘蓝菜、鹅等商品，甚至理发师、家庭教师等的最高工资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法令异常严格，触犯法令的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物价冻结后，市场立即陷入萧条，利息率也不断被抬高，法律进而又将利息限制在6%——12%之间。自然，正常商业活动全部转为地下经济，游离出监管体系之外。这个法令很快被下任统治者废除。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有数不胜数的论文，但货币贬值导致的物价上涨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罗马帝国的这次通货膨胀，与1000年后出现的纸币无关。纸币本位下，货币价值更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和信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产生于中国宋朝的成都。宋朝于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国，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当地铜矿不足，流通货币奇缺。商人便纷纷发行自己的票据用于交易，即“交子”。1005年成都的知府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统一发行交子，从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1023年政府还在成都建立了专门机构“益州交子务”独家发行交子，次年在全国统一发行。交子除了用于商业和消费交易外，主要用于战争的军用和财政管理的民用。

1069年，丞相王安石进行改革，试图把茶叶、食盐、谷物等重要经济资源统一国营，同时强制执行税收货币化。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大交子的发行量。在1107年，国家交子发行达到2400万贯，超过额度的20倍。市值跌到面值的10%以下。此后的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是采用纸币的方式不断盘剥大众，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也间接导致政府垮台和改朝换代。尽管文献中少有关于通货膨胀的分析，但纸币大明宝钞导致严重危机而被废除之后，中国长期严禁纸钞发行，经济都维系在银两本位的基础上。

几乎所有发行纸币的国家都有通货膨胀的历史，在特殊情形下，还产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在中国金融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民国期间和几年前的津巴布韦恶性通货膨胀的纸币原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经济衰退期，整个欧洲在1920—1921年间，制造业下降了9.5%。英国失业率高达11%，美国失业率则达11.5%。相较之下，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发生在战败的俄国和德国，并且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其中，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从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物价指数由262上升为126160000000000，上升了4815亿倍，被称为“经典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当时的德国政府无法从税收中筹集足够的资金支付战败国赔款，只能将财政预算平衡的压力转移给印钞机，这一行为极不负责任，但是看起来却是当时唯一能缓解内忧外患的政治压力的权变策略。当然，后果令人发指。通货膨胀爆发后，德国所有薪水必须按天发放。甚至有这样的记载，发工资前，大家通常都要做好热身准备，拿到工资，立刻以最快速度百米冲刺，跑向市场与杂货店，因为晚一分钟，物价都有可能上涨很多倍。德国的恶性通胀最终为纳粹上台提供了土壤。

而进入现代，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则最为知名。2008年7月，津巴布韦开始发行面额为1000亿元的钞票，其官方表示通胀率已经达到了2200000%。起初是由于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强硬态度导致了津巴布韦进出口贸易的停滞，而后政府为了填补财政赤字开始滥发纸币，在通胀与商品供给量不足的双重作用下，大量商店倒闭，失业率开始上升。为了挽救经济，津巴布韦政府加大了货币的供给，最终创下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通胀率的纪录。更加不幸的是，几天之后这个纪录便被打破，到了2008年11月，津巴布韦的月通胀率已经达到了796000000000%，在世界经济史上位列第二，仅次于1946年的匈牙利。在经历了10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后，2009年，津巴布韦终于放弃本国货币，开始使用美元。至此，经济形势才逐渐趋于稳定，并且开始逐步恢复。

[查看原图](#)

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强国，仍然需要时刻与通胀做斗争。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

危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了应对通胀，决定将黄金价格提高，从一盎司兑换20.67美元提高到兑换35美元，让美元大幅贬值。二战后的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的通胀政策和外国央行越来越担心他们不断增长的庞大美元储备，美元开始承受压力，美国政府开始通过对一些领域实行控制和政府干预做出回应，这些措施保留了黄金可兑换性、美国国债市场、利息均衡税，最终甚至对薪资和物价进行了干预。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脱离金本位，将美元与黄金继而与白银彻底脱钩，从此持有美元纸币者再也无法向银行系统兑换黄金和白银，美元价值的唯一维系是美国政府的信誉。今天，黄金兑美元的价格已经超过脱钩时的几十倍，美元大幅贬值。

无论使用金属货币、金属汇兑纸币还是今天完全依赖政府信誉的纸币、电子币，确定交易需求、储备需求和更加复杂的需求（如货币收藏者）并为之提供合理的供给量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市场解决方案，有政府解决方案，也会有同业或国际协调解决方案。在不同发展阶段，市场、政府和同业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解决方案的实施也伴随着不同的结果，如经济发展、市场崩溃、政府破产等，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过程。各种学术观点、各种政策依据、各种效果判断等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金融发展历史图解。人类并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还是会成为现实的，这就是我们始终关注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原因。

[1] 马略（约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2] 苏拉（约公元前138—前78），古罗马统帅，政治家，独裁者。公元前88年任执政官，为争夺米特拉达梯战争指挥权与马略发生冲突，相互仇杀，争得兵权后率兵东征。

[3] 奥古斯都原意为“神圣的”，“高贵的”，带有宗教和神学式的意味，一般用来指称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屋大维”。

[4] “劣币驱逐良币”是指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 第三章

#### 宋代交子与欧洲纸币的来龙去脉

约在2600年前，金属货币最早起源于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国。纸币则起源于中国的成都，约在1000年前。在金融史的意义上，纸币的创造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了货币化程度、交易手段的复杂性、纸张的发达和管理的细致，而且表明了政府信用能力和社会繁荣的状态。欧美国家都是在工业革命发生时的17世纪末才使用纸币，中国纸币的早期应用和消亡便成为迷津一段。

前文我们提到过，宋朝于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国，并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并要求当地用铜钱支付税款。但四川铜矿不足，铁钱被废、铜钱昂贵，流通货币奇缺导致市面冷落、经济萎缩，民间便出现了许多便利商人经营的“交子铺户”。商人把周转钱币存入，用时支付保管费用提出，这些存款凭证即“交子”，泛指用于交易的票据。交子和交子铺户均是民间商人操办，依赖商号和铺户的信用立足，交子作为票据可以在市场上抵押、转让，独立于铜钱流通。它的出现，便利了大额交易，也节省了铜钱的使用，尽管有少量的伪造和欺诈出现，但交子的流通还是受到了民间欢迎。

交子在发行和流通上的成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005年，面对战后金属的匮乏和经济的萎靡，时任益州（今成都）知府的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把他们的票据收齐，由政府统一印制，并且上面盖上公章，统一发行交子，这一举动代表了政府信用。用政府信用支持商业信誉，使得交子获得了巨大成功，商业票据得以脱离发行商家的信誉和偿付能力，作为通用支付手段，并且超出商家市场范围，在政府管辖领地作为法定支付工具流通。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两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

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1256340贯，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

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1023年，政府建立了交子专门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次年，开始在全国统一发行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9%。至此，世界上第一种纸币正式被确认。

中间有一个插曲，在史书记载中，中国早在唐朝时期就有被称为“唐飞钱”的商业票据作为货币流转，比交子早了300多年，但它只是货栈之间的买卖凭证，并不能付现使用。例如一个商家亏欠对方的货款，被欠者又是其他人的欠债者，处于中间位置的人就可以使用上家的欠条来付给下家，这样一层层往下，到最后一家，凭借欠条兑现。尽管它在实际上也属于一



种货币，但只在商家和产业链中流通，并没有被更广泛的市场所接受，既不面向普通消费者，也没有政府的支持，缺乏强制力，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又不是货币，只能称为发达的商业票据。所以交子在得到政府背书后纳入发行，才成为了纸币真正的里程碑。

交子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但是北宋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发行量，在政府需要巨额财政开支时，便利用手中权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例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益州交子务在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在陕西发行交子60万贯，用来支付粮草费。交子的泛滥和政府信用的丧失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也是北宋积贫积弱和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069年，在北宋社会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丞相王安石曾以富国强兵为由推行了一次改革，试图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纸币当时同样成为重要的手段。王安石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在过度发行导致交子大幅贬值到不足面值10%后，再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发行新的纸币“钱引”，与以盐、茶等商品为依托的盐钞和以军需品为依托的各种代金券等多种纸币同时流通，这种做法一时形成中国纸币发行的最高潮。

王安石是一个强势宰相，他上台后进行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发行统一纸币以取代各种官方和私人的地方纸币。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官员薪水和军人军饷都使用官方纸币发放；其次，土地补偿纠纷也使用官方纸币；最后，官方纸币在全国范围推广，政权范围所及的地方都在推行中央纸币。混乱的发行体系和在外敌入侵下分崩离析的宋朝管理格局，不仅使王安石变法失败，而且也使政府信用崩溃，导致民间出现“钱荒”，老百姓大量囤积铜钱。本来试图通过变法扭转社会经济颓势的王安石，却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和经济萎缩。

交子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北宋和南宋都曾在商业发展和政治混乱中产生了各种商业票据的货币化现象。例如在杭州出现了“会子”，也是商人交易中取钱的凭证，多在售货、赊账或典当等交易中形成，在民间流通，也取代了铜钱的功能。朝廷曾严令禁止这些地方纸币，但无法生效。1160年，杭州知府钱端礼沿用交子的经验，干脆将会子收为官营，设立了会子库，将会子作为官方纸币发行并管理，在江南一带流通一时。

宋朝衰败之后，相继统治中国的金朝和元朝更是以掠夺资源和财富为导向，变本加厉地发行“交钞”、“中统元宝交钞”等纸币，并且面值不断加大，含银价值不断降低。尽管进行了金银本位和记账银本位等各种稳定币制的尝试，但是，在内乱、外战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整体经济趋于崩溃，金银货币藏入民间，市场竟然在元末时期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原始地步。

其实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意识到了货币规律，最终的失败是由于急功近利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造成的，而中国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在金朝和元朝。金、元是游牧民族，而非农耕民族，他们习惯的是掠夺性的边塞经济，进入中原后，发现拿纸片就可以换东西，完全没有成本，却并不明白纸片背后的奥秘。有史料记载，元朝皇帝在通货膨胀时用纸币发放军饷，导致军人哗变，冲入京师抢劫，皇帝因此逃亡失踪。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立即明确恢复铜钱本位制度，但苦于一时不能有充足的铜矿和钱币供应，不得不发行“大明宝钞”，但严格限制在财政收支使用上，不能与铜钱和其他贵金属兑换。不过，经过300年无节制的纸币发行和政府竭泽而渔的历史，中国民间对于纸币已经毫无信心，纸币不仅没能进入民间市场，最初在政府与军队中也受到了排斥。结果，惨淡维持了200多年后，“大明宝钞”在1522年被皇帝下令废止，正式停用。

白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了中国市场的主流货币。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中国本来稀缺的白银储藏和日益壮大的市场规模，恰到好处地与全球白银时代交会。从拉美、日本和东南亚三个方向，白银源源不断地通过贸易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相对丰富的手工业商品陶瓷、茶叶、丝绸、布匹等，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大量的民间走私贸易真正撕开了闭关自守大国的面纱，这是后话。

如同造纸术一样，纸币的概氤也是从中国传入了欧洲。当时来东方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罗马教廷使者卢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把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介绍给了欧洲人。他们发现的不同之处是，中国商业票据的支持者是政府，而西方同样的商业票据支持者则是发行商家。几百年后，欧洲商业票据也转化成了纸币，但始终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直到最近100年才被各国中央银行加持追认。

第一张欧洲的纸币是由斯德哥尔摩银行（瑞典银行前身）在1661年发行的。不过，由于过度发行，无法用金属货币兑付而导致银行3年后停业。美国纸币是在公元17世纪90年代由殖民地银行首先发行的，而法国纸币则是在1720年左右才在苏格兰人约翰劳的主导下由法国银行大量发行。中国在晚清的19世纪60年代才再次出现纸币，不过，历史上的教训拖延了纸币的流行，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纸币才真正成为大众的交易货币。

先进的货币形态通过政府的强制跨越时代使用，至少有几个弊端：其一，过早脱离了货币与实业发展和消费能力的自然联系，货币蜕变为政府的执政手段和控制市场的工具，导致了货

币的非货币化过程，适得其反；其二，过早的货币职能分离导致金融货币与法定货币分道扬镳，市场的金属货币荒和政府的纸币通货膨胀同时恶化，破坏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宋、元两代政府的垮台一直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三，通过纸币来注水成为政府自然选择，急功近利的行为和大国崛起的幻觉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经济景气，但从历史远期看，会毁坏政府和社会信用，变成商业文明的内伤。有着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法国、德国和中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弥合伤口。

对比中国和欧洲纸币的产生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的政府能量远远超过欧洲，控制能力强，军权、政权集于政府一身。欧洲国家分裂，并且内部还有教权和皇权的分立，因此欧洲政府信誉远远不如中国。在中国，不接受政府信誉意味着犯罪，但在欧洲，如果市场不接受政府信誉，政府就会破产。从货币角度讲，只要有政府信誉，都可以叫货币，但是中国货币的统一使其货币影响力远远大于欧洲，也造成了中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土壤远远超过欧洲。欧洲“小国寡民”式的区域型货币使得跨国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必须以金银来结算，这也从客观上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早期欧洲除了纸币兑换，还有贸易和保险、雇佣军之间的交换等融资手段。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背景下，欧洲丰富的融资工具能够更强地抑制通货膨胀和分散风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由于没有内外部的博弈，强势政府控制货币和制造通货膨胀，同促进货币形成同样有力。欧洲的货币弱势和中国的货币强势相比，强势货币更容易成为政府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的手段，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更强，而西方的货币弱势只能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手段之一，于是给了其他金融工具自行发展的空间，例如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及债券和长期资本市场的出现。从中国的货币发展以及同欧洲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形式能够刺激官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压抑了民间经济和多元化经济的发展。

#### 第四章 十字军东征的金钱魅力与文明迁徙

十字军东征一直是一段神秘的历史，它是一场历经近200年，动员了千万人，跨越了欧亚非三大洲的一次战争，其中充满了血腥屠城、背井离乡、纸醉金迷的气氛。多年前，笔者曾游历耶路撒冷，也参观了多个十字军战场，陪同讲解的无论是阿拉伯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是非教徒的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这个暴行和对文明的摧残。但是，翻阅了许多历史著作和资料，十字军东征仍有太多的迷思需要去重新解读。

1000年前后，经历了罗马帝国衰落后的欧洲正在成为基督教的后院，宗教势力在与世俗权力争夺民众中取得上风，旨在回归宗教精神的克吕尼运动[1]已经将欧洲民众的价值观和财富观紧密地与基督教教义和朝圣联系起来。同时，社会也在发生巨大变革。首先，欧洲社会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封建领主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财富，扩充政治、经济势力；其次，西欧实行的长子继承制，使得大量贵族无法继承遗产，成为纯粹的“骑士”，他们中的很多人依靠服兵役和劫掠商旅为生；最后，西欧新兴的城市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企图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商品市场。此外，受到封建领主压迫和饱受饥荒折磨的农民，也想寻找摆脱饥饿和封建枷锁的出路。

在封建公国林立、乡村正在逐渐城市化的过程中，领土之争、宗教迫害和家族纷争使得大批骑士和农民流离失所，在欧洲不断迁徙求生。基督教声称的“千年末日”成为教徒和民众改变自己命运的共同历史机遇，而到耶路撒冷朝圣则是必需的赎罪方式。

此时的耶路撒冷已经在伊斯兰人手中统治了300多年，并且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彼此对领土的争夺战，在中欧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之间形成了极深的宗教仇恨。伊斯兰教极端派在1009年出于报复摧毁了耶路撒冷的所有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并封锁了基督教徒的朝圣路线，继而又进一步在1071年大败拜占庭帝国军队，使得后者不得不向罗马基督教廷求救。

尽管同样信奉基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与远在西方的罗马教廷，已经基于神学理气和权力争夺在1054年就正式分道扬镳，形成了西方的天主教和东方的东正教两系。拜占庭的求救恰好给了罗马教廷一个绝佳的机会大举东进。此外，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诺曼人刚刚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西西里岛，意大利沿岸各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阶层和共和国舰队等都强烈渴望在地中海和阿拉伯人控制的红海建立政治和商业的优势，毕竟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就在这样的社会变化、种族冲突、宗教对立和商业期待等因素下，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分别在意大利和法国召开宗教大会，号召基督教徒以十字徽为标志组织圣战，向耶路撒冷进军，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圣地。在法国的克勒芒宗教大会结束后，乌尔班二世发表了煽动性演说，他历数基督教徒在东方的痛苦和突厥人的“暴行”，号召贪婪的领主、好战的骑士、冒险的商人和盲从的农民统统拿起武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他还允诺说，凡是参加远征的人都可以赦免罪过，死后直接升入天堂。就这样，宗教感情的冲动和物质利益

的诱惑，使西欧各个阶层全都狂热地投身进了这场战争。

从1096年开始，十字军发动了对伊斯兰教徒长达200年的宗教战争，直至1291年才结束。在阿拉伯世界，这场战争多认为是由法国牵头发动，所以被称为“法兰克入侵”。尽管十字军以捍卫宗教和夺回圣地为口号，但事实上这是一场财富掠夺和领土瓜分的野蛮之旅。

十字军东征一共进行了9次。1096—1099年是第一次东征，也是唯一胜利的一次，当时参加的人数约有10万。1097年，四路军队在君士坦丁堡会合，随后渡海进入小亚细亚，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2]的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又在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并且按照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若干封建国家。

1202—1204年结束的第四次东征由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发动，主要由法国和意大利贵族组成，目的是占领埃及。有趣的是，在没有足够的金钱付给威尼斯人以便渡海到埃及的情况下，十字军按威尼斯贵族将领的建议转去攻打扎拉城[3]，并利用拜占庭内乱攻打君士坦丁堡，在抢劫后血腥屠城3天。这次东征虽然没有击败穆斯林，但最终威尼斯占领了拜占庭帝国3/8的领土，十字军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起了拉丁帝国和两个附庸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国家——雅典公国和亚该亚公国。

十字军东征的组织是非常混乱的，除了法国、德国、英国和罗马教廷等拥有由教皇和皇帝亲自统帅的正规部队，并且有明确的土地掠夺和财富获取目的外，其他多数成员均是没落贵族骑士和流离失所的平民。他们几万人、几十万人地出征，四面八方方向耶路撒冷进军，但没有资金和后勤支持，甚至没有确定的行进路线和日程，完全靠沿途抢掠，得手了就给当地居民和城镇带来灭顶之灾，失败了便溃不成军，任人宰割。1099年，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后立即血腥屠城7天，杀死几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202年的第四次东征，罗马教徒向同宗的东正教徒圣地君士坦丁堡下了毒手并且再次血腥屠城，掠走无数金银财宝，这些都是极好的例证。1291年，在第九次东征时，耶路撒冷易手，被阿拉伯人占领，标志着十字军东征的彻底失败。

十字军东征在西方历史上被视为野蛮的宗教冲突，臭名昭著，但在东西方文明的改变和彼此交流上却有不同解读。只要去过西西里岛和耶路撒冷，便会明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文化影响了服饰、习俗、商品、宗教、艺术、技术等各个领域。今天更多的历史学者认为这次跨世纪、跨区域的冲突和文明迁移，事实上导致了先进的东方文明真正进入了欧洲，瓦解了领主封建制度，启发了文艺复兴，推动了商业与产业革命的兴起。有国外学者曾评论：“十字军东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一个欧洲长期进攻的记忆。它的影响深刻，对当时可能是全球最强大、最具活力的穆斯林文明来说，东征及其造成的破坏打击了伊斯兰世界，动摇了穆斯林的信心；而对欧洲来说，十字军东征则是一个起点，它推动着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走向开放的现代世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讨论肯定仍将继续。

不过，本文要解读十字军东征，更侧重在过去少有关关注的货币财富力量上，从而窥探它的原因和影响。这是驱动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动力，但长期被忽视了。

第一，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经济正在恢复，乡村经济向城镇经济过渡，商业市场需求更多的货币协助交换。但是，由于欧洲金矿储备枯竭，基督教会又将大量金银币熔化，改铸成金盘和教堂装饰品。银币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而且非常稀缺。最为活跃的意大利商人通过在欧洲南部和西西里地区从事国际贸易，与阿拉伯人交易商品，兑换金银币而成为富商，引起了欧洲各地骑士和王公的嫉恨与向往。东方黄金的传说和暴富的憧憬一直是驱动大众参与十字军东征的最主要和最靠谱的动力。

许多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没落贵族骑士，最后都没有回到欧洲，尤其是那些在欧洲没有继承土地机会的人，他们留在东方圣地建立起了军事、文化和商业前哨。他们在第一次东征后建立起来的要塞，常常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移植，这些人通过战争在东方世界获得了他们在西方世界失去的东西。

第二，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曾长期控制地中海沿岸的超级大国，处于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接壤地带，其货币是金币贝占特（Bezant），流通了500年之久，主导着欧洲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也在欧洲各国成为币制稳定的硬通货，堪称是中世纪的美元。而与它同期相抗衡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波斯王国则采用了同样悠久、稳定的银本位制度，控制了伊朗和伊拉克地区。这两个大国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财富最多的文明帝国，但在军事上都十分落后，引起欧洲各国长期的垂涎。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拜占庭帝国传统的军区制度早已濒临瓦解。由于多次发生军事将领插手皇族内部斗争的情况，巴西尔二世（958—1025）之后的历任拜占庭皇帝都在解散军区 and 世袭部队，以遏制军事贵族的发展，他们用雇佣兵代替职业军队，同时削减军事经费，以限制军人势力。实际上，这些措施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军事贵族铤而走险，发动政变，造成了内部的恶性循环，这一内部恶性循环使得拜占庭帝国在外部势力的攻击面前无力抵抗。国家财力



进一步衰弱，只能进一步削减军事开支，又形成外部的恶性循环。

同时，东征前突厥人夺占小亚细亚，使得拜占庭丧失了黑海沿岸的商业据点，在同新兴的威尼斯、热那亚、加泰罗尼亚商人的竞争中，拜占庭开始处于下风。例如诺曼人入侵希腊南部的底比斯和科林斯等丝绸工业中心，将大批养蚕技师和丝织工匠带到西西里，打破了拜占庭对丝绸的垄断地位。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则彻底破坏了拜占庭的商业地位，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在拜占庭帝国晚期的若干次皇室斗争中，为了获得资金，拜占庭皇位争夺者时常以商业贸易特权做抵押。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作为东方商品集散地的地位，被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商业据点夺去。到14世纪，拜占庭的商业已经完全萎缩。

第三，7世纪起，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义，从麦地那起步建立起穆斯林帝国，在300年间便吞并了波斯帝国，并击败了拜占庭帝国，成为新兴世界强国。帝国的形成，使得商业贵族进入统治阶级，很多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非欧三大洲，从事中介贸易。他们的活动范围甚至一度延伸到了西欧，对欧洲商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威胁。同时，阿拉伯人征服世界的时候，也继承了拜占庭和波斯两国的金银币本位制度。除了在麦地那有金矿外，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黄金来源是非洲，而控制耶路撒冷和中东就可以扼住阿拉伯人的咽喉。

第四，埃及在法蒂玛王朝时期（909—1171）成为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国际贸易的中心，源于苏丹的黄金在埃及被铸造成金币第纳尔，并在阿拉伯和基督教地区广泛使用。来自国际贸易的税收成为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亚、非大陆之间的红海已经取代亚洲内陆的波斯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此通道通过亚历山大港进入地中海，从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这就是欧洲教廷、法、德、英皇帝和意大利商人们最关注的商业财富焦点。十字军东征将欧洲的新兴商人同一个广阔的财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对中东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欧洲必须拿出自己的物品来交换，由此促进了欧洲羊毛和纺织业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的最终失败，使得阿拉伯人牢牢控制了中东和红海，也扼守了地中海，欧洲人通向世界的咽喉要道始终不能通畅。但欧洲人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冒险精神，让他们在直接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和间接吸收了中国文明后，掌握了算术、航海术、火药、印刷术等先进技术，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终于，他们另辟蹊径奔向东方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到来了。

[1] 克吕尼运动：10世纪末—11世纪天主教会内部的一次重大改革运动，因以法国克吕尼修道院为中心，故为此名。

[2] 塞尔柱突厥人：即更早些活跃在远东中国边境的突厥人的后裔，是西突厥汗国乌古斯部落中的一支。

[3] 扎拉城：今克罗地亚的扎达尔。

## 第五章 维京海盗消亡的货币迷踪

2007年冬天，专门探宝的大卫·惠兰和安德鲁·惠兰父子，在英国约克郡哈罗盖特发现了一个古代罐子。罐子已经有千年历史，里面储藏了617枚银币，及一个实心的黄金臂环，还有许多银制饰物和没有打造成形的银块。经过考证，这些财富属于一个维京人的首领，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将财富深藏于此。如今历史学家们对于流传已久的维京海盗和维京人有了更加确切的了解。英国文化大臣霍奇说：“这种发现对我们的历史而言是无价之宝。”英国此前只发现过一次维京海盗宝藏，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发现也不过六七次。因此，这罐宝物便成为大英博物馆重要的馆藏品。我们也因此有机会了解，银币是如何揭示一个民族的兴亡与演变的。

史书上记载的维京人（Vikings）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北欧，即今天的挪威、丹麦和瑞典。当时欧洲人更多将之称为Northman，即北方来客。维京人以游牧和渔业为生，拥有当时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维京人从6世纪以来就通过波罗的海不断向欧洲大陆和俄罗斯进逼，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不过，从8世纪起，贸易就演变为商业掠夺和袭击。维京人不断突袭欧洲各国城市和宗教场所，掠夺财富，捕捉俘虏作为奴隶，甚至长期占领土地和城镇。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支维京人队伍沿着西欧的大西洋沿岸向南挺进，在欧洲的心脏地带掀起轩然大波。他们大肆劫掠大不列颠岛，并且还向西欧进行了侵扰。英语中的“维京”（Vikings）一词便带有掠夺、杀戮等意思。

维京人都是很好的水手和船匠，他们用橡木制造船身和船桨，用松木制造的桅杆可以在大风中适度地弯曲。维京人总是先用整条原木加工成龙骨，以保证强度。弯曲的船头和船尾单独加工，然后用铁钉固定到龙骨的两端。在龙骨上架好横梁之后，就完成了整条船的轮廓。沿着轮廓在船的两侧铺上蒙板。这样，轮廓上的整条木板层层相楔，上面一层刚好能覆盖住下面一层的边缘。在最上层的蒙板上开凿出若干小孔，5米长的木桨就能从孔中伸出。最后再铺上地板，架上桅杆，在桅杆顶上装上金属制的风向标。橹则安装在船体后部的右侧。船帆的两侧都挂上麻绳编制的网，防止船帆在强风中撕裂。这样制造出来的船，全长20米左右，是维京人最常用的船。这种“龙头船”分量轻、船身狭窄、吃水浅，足以保证在欧洲的

所有航道中快速行动。相比较，别国的船，设计很笨重，去不了远海。维京人又极为擅长战斗，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就开始训练，训练内容包括马术、划船、游泳，尤以摔跤为重点，哪怕是冬天躲在屋里玩阿拉伯传来的棋盘游戏，也总是围绕着攻守技巧。维京人数量相对较少，于是战斗中多依靠周密的策划与出其不意的突袭取得胜利。战斗中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狂热，从不畏死，让人谈之色变，被称为“狂战士”。由于维京人行动快速，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可以谈判的首领，加之掠夺的广泛和杀戮的残酷，欧洲各国深受其害，当时的大都市基辅、汉堡、巴黎、巴格达、君士坦丁堡以及英国所有城市都曾被洗劫过。8—11世纪被称为维京海盗的时代，至今仍在历史和传媒中不断被渲染和神化。加勒比海盗和库克船长的故事也都有维京海盗的影子。不过，在横行霸道了3个世纪后，维京人陆续安顿下来，慢慢消失在欧罗巴大陆的版图上。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版本描述维京海盗的去处：或者被英国国王镇压而臣服，或者被法国文化折服而同化，或者被基督教文明感化而放下屠刀，或者是发现了农业和商业文明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而转型。所有不同角度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历史依据。让我们看看熟悉金融的历史学者如何从银币中揭示维京海盗之谜吧。在确定这罐宝藏属于一个离开的维京首领之后，学者们开始专注于银币的来源。当时英国的东北部被维京人占领，西南部则是盎格鲁-撒克逊[1]人的天下。罐中银币的大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发行的，那些银条、银块也被维京人用作货币。令人惊奇的是罐中居然有撒马尔罕[2]、阿富汗和巴格达三个地区的银币。维京人的足迹遍布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里海、俄罗斯大陆、阿拉伯地区，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全球贸易和货币已经发展到了何种便利和快捷的阶段。如此广袤的区域，各种货币交易都能积聚在这个海盗的罐中。考古学家从北欧的墓葬群中找到了不少别的产品与钱币。不过，看得出来他们更加喜欢白银，商人随身带着天平，用银块充当砝码。石刻与传说记载了他们的旅行：860年，沿着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的维京人来到了俄罗斯。他们同当地的斯拉夫人做交易，从诺夫哥罗德[3]南下，沿河来到波尔加，用奴隶换取蜂蜜和毛皮；再顺着伏尔加河进入里海，换乘骆驼，一直来到巴格达，交易丝绸和香料。据考证，维京人的另一条贸易路线是沿着第聂伯河到达基辅，进黑海，到达盛产葡萄酒、丝绸的伊斯坦布尔，出售精美的珠宝首饰。根据维京人的贸易路径和货币积累，可以推知当时被维京人占领的乌克兰的基辅是重要的中转城市，来自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货物经过基辅和波罗的海到达北欧。从银币的多样和磨损可以看出，这个贸易不是直接的，而是不断接力的结果。罐藏的银币中有几枚是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瑟尔斯坦（Aethelstan, 923-939）制造的，年份是927年。正是这个国王最终打败了维京人，统一了英格兰岛，使得分裂了几百年的英格兰终于成为一个国家，从而得到其后历届英国国王的尊重。另外几枚银币上，圣徒彼得手中的剑被改成了锤子，这是维京人信奉的挪威教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出，维京人正处于宗教皈依的过程中，但顽固地保留着历史。从这个罐子保存得如此完好这个情况上也可以推测出，这个维京首领只是打算暂时离开信奉基督教的约克郡而已。一部分维京人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他们基本迁徙到德国、奥地利一带，与古日耳曼人融合。一部分维京人被法国国王用土地和爵位收买变成诺曼底公国居民。另一部分维京人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建立起俄罗斯公国。当然，今天的无数英格兰人也是维京人的后代。甚至历史学者还指出，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维京人已经访问并占领过这个新大陆。维京人已经是一个消失在欧罗巴大陆的民族，但维京海盗却始终是现代文明的梦魇。关于维京海盗的故事和传说还有很多，其中许多流传很久，被大家熟知。但笔者最关注的是，如同任何一个人人类族群一样，货币成为维京人贸易和储藏财富的工具，它们是如何帮助维京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成为日耳曼人、诺曼底人、英格兰人和俄罗斯人的一部分，并进入农耕社会安居乐业的，又是如何帮助维京人在近代历史上扮演发现新大陆和殖民者的角色的。显然，货币和金融体系对一个活跃了几百年又融合于欧罗巴的民族文明历史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可惜的是，我们的现代史和人类文化对金融这样的制度演化远远不够重视，没有像科学进步、技术发明、政治体制和语言学等一样进行系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如同维京人一样具有迁徙意识的族群，如曾远征欧洲的蒙古民族、今天的吉卜赛人等，都是没有多少金融制度安排的族群。当年的蒙古人占领中原地区直接照搬了宋朝先进的货币制度，而且赋予其更多的掠夺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不过，同样是在全球迁徙的犹太民族，则最终建立了令所有民族望尘莫及的金融帝国，这真是值得研究。[1]盎格鲁-撒克逊：本意就是盎格鲁（Angles）和撒克逊（Saxons）两个民族结合的民族，是一个集合用语，通常用来形容5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在语言、种族上相近的民族。

[2]撒马尔罕：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自古以富庶、商业发达而闻名。

[3]诺夫哥罗德：俄罗斯一个最古老的城市，建城于859年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第六章：美第奇家族哺育了文艺复兴

无数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形容为阴险和粗俗的金融家，以其巨大的财富能力塑造了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中国金融博物馆有一幅金融与艺术的家谱图，受到众多访客的青睐。在这幅图上，活跃在15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被绘成粗壮的树干，而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伟大艺术家和作品则被放置在茂盛的枝干上。

[查看原图](#)

这些艺术家有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多那泰罗、提香等，每个伟大艺术家都开创了历史，而美第奇家族则“哺育”了他们。不仅如此，受到美第奇家族资助的还有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科学家伽利略。而且这个家族还产生了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皇后，其中一位还推动了法国卢浮宫的诞生。

在经济史上，美第奇家族是现代金融业的开山鼻祖。13世纪以来，经过十字军东征的洗礼，欧洲通向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的传统海洋贸易路线被阿拉伯人切断，意大利成为欧洲最主要的贸易大国，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控制了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进口。

意大利人在跨国贸易扩张中积累了大量的周转资金和财富。专门从事货币汇兑、货物抵押、结算、保险和有息贷款的商业银行在这个国家纷纷诞生。排斥贷款付息的基督教势力较弱的佛罗伦萨逐渐成为金融中心。特别是在1252年发行了金币弗洛林后，佛罗伦萨创造的标准货币在整个欧洲广泛采用，进一步巩固了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地位。

美第奇家族是13—17世纪称雄于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该家族最初经营兑换钱币的钱庄，后来随着财富的大量积累设立了银行。在众多家族领袖中，三个重要人物维系了美第奇家族的传奇。

乔凡尼·德·美第奇（1360—1428）奠定了这个家族的财富和政治根基。1397年，乔凡尼在佛罗伦萨建立了后来被金融界广泛认可的第一家股份制美第奇银行，1万弗洛林金币的资本中，乔凡尼占55%。乔凡尼专注佛罗伦萨当时最为活跃的羊毛加工业和贸易业，采用所有已经被创新出来的商业票据等金融手段，迅速领先欧洲同行。

乔凡尼在1402年担任了佛罗伦萨的银行商会主席，并通过资助艺术家提供市政建筑艺术作品赢得最初的社会声誉。经过多年的人际关系经营，乔凡尼扶植了曾经落魄不堪的主教当选教皇，从而在1410年接管了遍布全球的教区汇款和善款的经营活动。从此，为罗马教皇体系提供银行服务成为美第奇家族财务的长期资源。

而对未来下地狱的恐惧和赎罪情结，也成为美第奇家族始终看重和资助宗教艺术的一个内心动力。乔凡尼是美第奇家族第一位资助艺术界的人，他欣赏并长期赞助马萨乔，正是这位早逝的天才在透视法等方面对绘画做出了彻底的改革。

科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则代表了这个家族的权力高峰，他在美第奇银行接管罗马教皇的财政后，利用宗教势力的支持，不断参加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地区的政治角逐。在经历了一段失败并接受政治流亡的过程中，科西莫沉浸在宗教艺术和对历史遗迹的搜寻中，培养了对古代艺术和文献的鉴赏品位。科西莫在1434年回归佛罗伦萨并长期操控市政府，成为无冕之主。

[查看原图](#)

科西莫是希腊罗马时期文献和雕塑的狂热搜集者，引进了多那泰罗这样的艺术家为佛罗伦萨创造传世的大卫雕像。他还支持穹形屋顶的创造者布鲁内莱斯等一批建筑师全面改造了城区，宫殿、图书馆、教堂、修道院等纷纷采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造型。这使得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之城，成为欧洲艺术家云集之地。科西莫本人也是最重要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者。

洛伦佐·德·美第奇（1449—1492）让美第奇这个家族真正与文艺复兴的伟大运动和佛罗伦萨的历史成就结合起来。他二十几岁便接替祖父科西莫的统治者衣钵，与罗马教皇合作巩固他在佛罗伦萨的支配地位。一次政治暗杀中的侥幸得生，让他更加注重强化军事实力，使佛罗伦萨的实力大增。

不过，洛伦佐的伟大还在于他亲自提携和资助了三位影响人类文化的艺术大师，即画出《维纳斯的诞生》和《春》的波提切利，画出《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的达·芬奇，以及画出《创世纪》和雕塑“大卫”的米开朗琪罗。这三位大师以及日后间接受益于美第奇家族的伟大画家拉斐尔、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和科学家伽利略等都是意大利和欧洲的一时之选，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杰出成就也给洛伦佐带来了巨大的光环。

在三位杰出人物之后，由于欧洲稳定和平的环境不再，教廷争夺和意大利诸国与法国之间不

断征战，美第奇家族后继者无力维持大局，多次被驱逐或剥夺权利，重心一度南移到罗马。再加上意大利羊毛加工业衰落，英国纺织业兴起，贸易和金融的中心也渐渐北上，美第奇家族每况愈下，不足百年便没落了。

多年前笔者曾到意大利佛罗伦萨游览，三个主要的宫殿——美第奇宫、乌菲兹博物馆和碧提宫博物馆都曾为美第奇家族所拥有。一个从高利贷生意起家，精于计算的金融家族，沉浸在中世纪前的古典浪漫艺术之中，并主导开启了文艺复兴时代，这与大众文化认知中对于金融家的定位相去甚远。

事实上，美第奇家族与后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等一样，在当时的传媒记载中也多是负面阴暗的，往往被政府和社会群体视为公敌而动辄得咎。这主要是基于他们强大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他们的商业创新被视为巧取豪夺之举，他们的权势追求被视为阴谋和贪婪，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炫耀与堕落，他们的性格和风格被刻意丑化和憎恶。权势很少会在历史上被公共知识分子认可，而后者却是记录历史和塑造话语体系的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融家族在社会声讨和文化鄙视中始终安然无恙地从事他们注定要创造的事业，持续积累财富和声名（即便是臭名昭著），继续成为大众仿效和跟随的榜样。最终，正是这些被鄙视不懂文化艺术、举止粗俗的金融家族，用他们巨大的财力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崇拜敬仰的文明里程碑，也迫使公共知识分子们并不情愿地给予他们起码的历史尊重。

重温美第奇家族的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商业和金融是艺术和文明的温床。

没有商业的积累，没有财富的投入，没有财富来认可和衡量艺术的价值，艺术家就不能得到持续的支持，从而摆脱贫穷的烦恼，继而来专注于艺术创造；也不能集聚交流，形成艺术家群体，激发各自的才能；甚至不能引发社会对于艺术的认可。

即便人们总以凡·高为例，试图证明伟大艺术家可以是饥寒交迫的产物，但如果没有凡·高弟媳的经营、传媒的发掘和不断接力的投资者支持，凡·高会如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被遗忘在历史上。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商业发达和金融家族集中的地方，也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最旺盛的地方，美第奇与佛罗伦萨的历史就在于此。

金融是创造价值的商业活动，不是巧取豪夺和毁灭社会财富的祸首。人类只要成长，就会有产业的形成和分工的确定，而价值交换是所有商业活动的核心。产品交换和上下游产品的整合就自然有专业和专注的货币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最大效率、最低成本地建立了便利商业交换实现的市场规则，提升了体系稳定和成长空间，降低了所有参与者的风险。

美第奇家族的成功经营，巩固和保证了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成为欧洲的贸易和商业中心，并有能力吸收当时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乃至教皇的关注。同理，今天金融最发达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上海等，也是最发达的艺术文化中心。

第二，财富应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换句话说，什么人能够最有效地将财富用于创造价值和推动人类进步，这是一个容易引发分歧的问题，也是值得不断讨论的课题。

美第奇家族控制了佛罗伦萨的财富和政治，推动了艺术创造，带动了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法国的财富集中于国王手中，在欧洲到处穷兵黩武、争夺地盘。罗马的财富集中于教皇手中，横征暴敛支撑着腐败与奢侈的时尚。威尼斯的财富则集中于商业贵族群体，唯利是图的社会中，盛行商业实用主义。

王权和教权垄断财富，必然剥夺民间的创造性和自由主义激情，分散化的商权也难以超脱竞争压力而关注精神世界。美第奇家族最重大的贡献便是将目光投向艺术创造和科学创新，并且在佛罗伦萨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大众信义，即艺术和文艺复兴才是真正的财富。他们不仅自己长期投资艺术，而且迫使自己的敌手也在这个平台上参与竞争。

不过，多数获得了财务安全的艺术家们却总是刻意拉开与财富的距离，渲染自己的创造力与财富的负相关故事，甚至不断攻击财富给艺术带来商业污染，并使其品位低俗。这种艺术家的不自信恰恰表现了财富对艺术的呵护和宽容。同样，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矫情地批评财富创造和金融家阶层，对现代化社会的浪漫怀旧看上去更像是早期商业和金融秩序的称颂。

第三，宗教、政治和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艺术的尊重，是美第奇家族传奇得以实现的前提。

美第奇家族成员曾两度被政治流放并经历暗杀的洗礼。但其家族的资产，特别是大量艺术作品和珍藏文献却始终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美第奇长期经营的宗教势力和政治体系都明确保护私有产权，政权和教权的更迭也没有绑架家族利益和市民利益。商人和金融家的社会地位始终是独立和具有尊严的。这与中国历史上将财产包括人身都当作政权衍生品和依附物的认知全然相反。制度的稳定与安全造就了美第奇家族在商业经营和艺术推动上的长期信心。

参考中国金融业的同行，如明末沈万三家族、清朝和珅家族、民国孔祥熙家族，我们可以痛切地体会到制度环境不同造就的巨大差异。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txt

金融家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决于金融之外的社会因素，特别是文化观念对财富的认同，政治法律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改朝换代对商业契约和人文传统的继承，等等。没有这样的土壤，金融的发展无从谈起。

[查看原图](#)